

全球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口述史

甲—访谈员 乙—张李玺院长

甲：张李玺院长，从您这个个人成长、生活和工作背景上看，您在接受女权主义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为这样的过程，请您具体谈一谈。

乙：要说从自为到自在的过程，应该说是您概括出来，我自己就很难对自己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说哪个阶段我是比较盲目的，哪个阶段我是比较自觉的，哪个阶段是非常积极投入的，我觉得我自己很难有这样的划分。但是应该说我仔细回想起来这样的过程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我很难忘的。我记得是 94 年也就是 95 年世妇会的前夕，当时应该是在国内，很多行业、大学，包括很多对妇女大会比较感兴趣的人士都非常投入，在筹备这个世妇会，特别是 NGO 论坛。我记得 94 年，有一个香港的女权主义作家，姓黄，当时她来到北京，我记得当时她请了几个朋友在一起，想写一本，也是类似的一本像是你是怎么样走上女权主义道路的书，她找了几个朋友，一起谈一谈自己经验，谈一谈生活背景，谈一谈自己的体会，想要大家一起反思和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经历。我记得那本书，她写的那本书叫《反响》，英文是叫“Reflection”。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在她的住所，几个朋友都在一起聊天呢，我们大家都在说，她在那儿记录，当时我们对她这种方法也感到新鲜。她把大家的记录记下来，整理后成为一本书。我记得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在一起谈，有一些人谈到了“我有什么事情对我影响

很大”，有一些人谈到由什么活动对我影响很大，当然有一些是积极方面的也有一些是消极方面的。比如说一个朋友，小时候她想打篮球，她穿裙子，她觉得很不方便，所以当时她就问老师“女孩子为什么穿裙子”……她的老师就跟她说，“那个女孩子就应该穿裙子，穿裙子漂亮”等等，她就记得很清楚，就是说，她嫌穿裙子不方便，穿裙子跑起来不好看，嗯，又怕露出什么地方，所以她就不参加这个体育运动。所以说，她就觉得，男孩子和女孩子为什么要有区别呀？后来还有一个朋友就讲，她在公司做事情，然后有一个老板是从国外来的，这个老板他自己有很强的妇女研究的背景，这个老板对她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家都谈了一些事情，她们怎么样关注妇女问题，怎么对妇女研究感兴趣，当时她们谈了很多东西。我在场就在想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怎么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呢？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事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后来我想过为什么呢，后来我突然发现其实我自己进入这个妇女研究这个领域应该是不自觉地掉入了，陷入了妇女研究的领域，然后就不可自拔了。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就去兰州大学工作，因为我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首批高考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我是带工资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是44块钱工资一个月，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6年的工龄，当时国家制定了政策，你有5年的工龄，你就可以带工资上学，我想是当时因为我们的这批人的背景比较特殊，因为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没有招大学生，很多……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24岁了，可是很多老高中的，这些人都比我大好几岁了，很多人都已经成家了，都结婚了。所以我想当时出台这一政策，就是考虑到了这批人的背景，因为没有工资的话，他们就根本不能够上学，因为要养家糊口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带着工资，就从兰州，因为我当时在那儿插队，然后就在那儿一个中学教书，五

年到六年，就带着工资上了北大。北大毕业的时候，又有一个政策，就是带工资的人必须哪来哪去，所以我当时就从北大毕业回到兰州。因为大学毕业，所以换了工作，不在中学，就在兰州大学哲学系。当时我就教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西方哲学史，我教古典哲学这部分。我当时就教像费尔巴哈、康得啊、黑格尔啊这些人物，就在那里又做了近5年。就这个时候，我跟我丈夫分居两地，他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北京，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兰州。有很多外国朋友问为什么我们要住在两个地方，我告诉我是分配去，很多人不理解。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中国特色，因为当时你要这个，祖国分配你到哪儿去，你就在那儿生根开花。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个说法，“每一个人就像机器上螺丝钉，党把你拧到哪里，你就要在那里发挥作用”。所以当时两地分居的情况在中国挺普遍的，不由你自己选择的。所以我在兰州，我丈夫在北京，但是过了5年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当时在北京有一个学校叫做全国妇联管理干部学院，它刚刚升格，她以前只是干部培训学校，后来就升格为有学历教育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人事部，就是管户口的部门，就给了这个学校一些进京的指标。它当时有一些要求条件，第一在外地必须是大学老师，第二必须有讲师职称，第三是两地分居--解决两地分居。当时呢，这几个条件我当时都满足了，这样我就被选择进了这所学校。所以呢，我不来这个学校就没有户口，我来这个学校，我就不知道这个学校是干什么的？所以我当时我拿到这个通知书让我到全国妇联报道的时候--因为这个学校是属于全国妇联的--所以我当时问了好多人，全国妇联是干什么的。很多人就是在大学教书，很多老师都不知道全国妇联是干什么的，一些人告诉我说，好像全国妇联好像是管街道办事处。后来，但是我想我没有任何选择，要这个户口，要想回北京，要想跟丈夫团聚，一家人在一起，我就必须要接受这个工作。应该

说我是无可奈何地来到了全国妇联管理干部学院，开始了研究妇女的工作。应该说非常糊里糊涂地，非常不情愿地，非常盲目地进入了这个领域。那我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没有我的课上，因为这个学校不开西方哲学史，也不讲德国古典哲学，也不开相关的课程，因为当时叫妇女运动系，那么我在这个系中，也就没有我的课可以上，因为哲学课已经有老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我要选择上一门课程，所以当时我选择了和哲学比较近似的社会学，我就来讲社会学的课程。在讲社会学概论过程中呢，我又开始了一门课，就是家庭社会学。在讲家庭社会学过程中呢，我势必会将家庭问题、夫妻冲突呀，女性地位呀，妇女角色呀，角色冲突呀等等，我就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逐渐地对女性这块领域有了一些接触和了解。我工作了几年以后，应该说这个阶段我还是比较有规律地但是不自觉地完成我的工作。这个不是我的爱好，只是我的收入。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又碰到一个机会，就是全国妇联选拔两个人，去加拿大参加一个叫做“妇女参与发展”的项目培训，叫做“women in development”这样的一个培训。那我就报名，最后经过英语考试，经过各种条件选拔，最后我就被选中了。就在1992年的9月份，我就去了加拿大，去参加了一年培训。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比较关注有关妇女研究的问题。因为在国内，我接触的材料的是非常有限，所以我去了以后，在参加正式培训之外，我就选修了一些课程，比如说，妇女学概论，叫做“Introduction to Women's studies”，还选修了妇女和环境——“women and environment”，还有像“妇女和健康”，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些课程。我就去听课，在这个课堂上，在和同学接触中间，在与大家讨论过程中，在和老师的交流中间，我就发现妇女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地，我就发现了一些我以前并不关注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去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在上

妇女和环境的课程时候，老师把我们带到大街上，晚上，我们被带到大街上走路，就让我们去观察，比如说在酒吧里，你都看到了什么，在大街你看到了什么，办公室的灯为什么全都亮着，都谁在里面工作。我当时没有想得太多。但是我们有很多同学呢，他们的发言就很启发我。比如说很多写字楼的灯亮着，这个时候快9点多了，快10点了，灯亮着肯定在打扫卫生。那么谁在打扫卫生呢，大家说应该是很多妇女在打扫卫生。为什么妇女在这个行业的人比较多呢？大家都开始，就问题一个个，一步步地深入下来了，这样地呢我就觉得这些问题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现象，他们要讨论现象后的原因，讨论这些原因，它又要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要联系在一起。当时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那一年的学习，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使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妇女研究和妇女问题的领域。所以这之前，我虽然在妇女学校工作，也在关注妇女问题，但是我自己把它划分为我是在工作，是为了一份收入而工作。但是在加拿大的学习的一年，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认为是一个推动，为我以后进入这个领域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那么我在1993年底呢，回到北京。当时呢北京已经开始在紧锣密鼓地筹备95世界妇女大会。我在北大的妇女讨论会上，认识了一个在北大教书的一个美国留学生——Lisa，当时我们两个在会上认识了，我们就开始聊天，互相交换名片等等。当时她就告诉我，她们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东西方妇女相遇”完全松散式的一个小组。她问我，你愿不愿意参加。当时我就很欣然地参加她们的活动。在那里我认识一批对妇女研究、妇女运动和妇女问题感兴趣的一批人物。我想可能这次访谈过程中有很多人在这个小组有这个经历。比如说葛友俐，当时她就是这个小组的召集人，当时她还在福特基金会工作，她就提供给我们这个场地。我们就每个星期，有的时候每两个星期互相打电话，晚上自

己到那里去讨论问题，分享经验等。这个时候我积极地参与，我开始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和自己想的的东西，和中国的妇女问题结合起来，开始思考和反思一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就自觉的，开始比较自觉地进入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色。

你比如说有时候我反思一些个人的问题，我经常说我的姓名。中国人给孩子起名字，它跟其他的文化的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习惯是不同的。中国人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它有非常深刻的一种期望在里面，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而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反映了中国家族文化中间的特色，就是这种“父子轴”的传递，这种家庭的延续，这种家庭香火的延续。另外一种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反过来要干什么呢，因为子女要完成对父母的这种抚养，他们是互相之间的期望，家长希望子女成才，子女成才后可以负担对家长老了以后的各种福利，因为中国毕竟不是一个福利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起的名字就很有特色的反映出中国人对孩子的期望却局限在哪些领域，有了什么样的特点。所以我的名字就比较奇怪，我的名字两个姓，中国一般就有一个姓，延续父系的家族。我姓张又姓李，那么这个李呢就是我母亲的家族姓氏。很少有人姓我这样的姓，特别是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两个姓呢？其实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因为我的姥姥就只有我妈妈一个女儿，因为她结婚一年以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以后她就没有再嫁，就跟着我的母亲住在婆婆家，后来就马上遇到了抗日战争，那么日本侵略战争的时候，姥姥的老家是在河北，就从河北逃荒逃到天津，又从天津逃难到河南，又从河南逃到山西，一直是我姥姥一个人带我母亲，当时就跟从逃难大军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逃。她讲起来她的故事非常地辛酸，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女儿，什么支持都没有，走到哪里什么要饭呀，自己在工厂里做工呀，最后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到我的母亲结婚的时候是23岁，我姥

姥说不论谁跟我女儿结婚，有个条件，必须姓我们李家的姓，因为她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她只有一个女儿，她这个女儿必须延续李家的香火，所以她就提出了这样的条件。我爸爸当时想跟我妈妈结婚，所以我爸爸当时就无条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选择，说同意，但是李呢必须跟在我们张家的后边，我姥姥就非常同意的接受了这样一个条件，因为她觉得李家的姓跟在人家张家的后面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家的孩子姓都有一个张李。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们家挺男女平等的，你看我爸爸我妈妈的姓都有，所以觉得男女平等。但是我到了一个自觉认识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时候，当有了一些反思的基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名字是一个最不女权主义，最不平等的名字了，其实我的名字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女性对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认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姥姥如果说她要争姓氏的话，她应该争她自己，对不对？因为她不姓李，她是嫁到李家的，她姓高，但是她没有争姓高，因为她认为她嫁到李家她就是李家的人。所以很多外国的学者在探讨中国的问题，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说，探讨中国社会问题时候不可以避开中国的家族文化这个背景，中国的家族文化应该是渗透了中国社会的所有方面，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从这样的中国的女性的对自己的角色的自觉的认识呢，她没有任何疑义，首先应该姓丈夫的姓，第二呢应该姓男家姓，她没有任何质疑。她说可以，她争了半天，为了她的夫家争了一个姓，可是她已经和她的丈夫家，已经离开 20 多年了，没有任何关联了，她独立一个人支持这个家，20 年以后，她女儿结婚的时候，她还是认为，我是李家的人。这就典型地反映了，费孝通提出来的“差序格局”，徐良光提出来的“父子轴”，它反映一个家族文化。这个家族文化的特点就是以男性为核心。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男权主义，就是父权，所以说父亲——儿子——父亲——儿

子，这样往下传递，其他的关系也是延伸的，是依附的，是附从的。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父子传递的家族关系中间，它延伸出来的其他的性别关系的时候，就自然地表现出来男主女从的，男尊女卑这样一些性别关系。所以当时我很自然地，就是想到了这样的问题……。

甲：那么你们在这个阶段还关注什么问题？

乙：当时在这个小组关注的问题是非常广泛。因为我们的小组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完全是松散的兴趣式的，没有任何规律地聚集在一起的人。比如说来自出版业的、大学的老师、还有工厂的，还有外资企业的等等，就是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大家都讨论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每次尽力讨论一个主题，就由一个人发言，大家来分享她在这方面的发现，经验，问题。比如说我们当时讨论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还有 NGO 的问题呀，男女角色的问题呀，……当时我们就比较关注这个媒体中间的……性别歧视的问题。当时关注的面比较广。所以说对这批人在中国的 NGO 层面的妇女运动者来说呢，以后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当时开始觉得我已经开始自觉的反思和发现一些问题了。我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它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 1994 年去上海开 95 论坛预备会的时候，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论坛主题为“妇女与教育”，我负责一个小论坛，叫做妇女与培训，是非学历教育这块，我们开一个会。我去报到的时候，这个报到的人，没有见到我之前就分配好房屋了，我去了拿了我的钥匙进了房间，当时我同一个屋里的人是一个男的，所以我去就找到会议组，说你们分错房间了。他们就发现他们就根本没有注意我这个人是谁，但是他们注意我的名字，他们觉得中国人没有这样给孩子起名字的，叫做玺，这个是我的名字，我的姓氏张和李，玺是玉玺的玺，是皇帝的大印，是非常有权力的一个字，

这个字绝大部分用在男孩子身上的，什么建国呀，斌呀用在男孩子身上的。所以我用了这个字是非常稀罕，非常少见，他们就理所当然，把我放在男生的宿舍。后来我自己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开玩笑，我说如果我叫张惠花叫李小琴什么的，你们是不是就准备把我放在女孩子的房子？他们自己就笑。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强的角色刻板印象，他们就凭名字就知道你。所以我经常在课堂上作这样的活动，就是说课堂的学生自报姓名，然后大家来看姓名中为什么用这样的字，女孩子们很快地发现她们的名字用了比较多什么霞什么花什么琴等，集中在这样比较美丽小巧可爱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接着去讨论，女孩子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呢？为什么家长会给女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呢等等？然后我们就展开讨论。我觉得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刚开始一开始我就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就是在这个女性的领域中间，但是我是比较茫然地完成我的工作。然后在加拿大的学习过程中，比较自觉接受了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培训。那么95 世妇会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把西方的东西结合中国一些特殊的问题上进行讨论和反思，并且试图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觉得自觉开始参与到这个妇女运动中来了。

甲：那您刚才说，您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那您对女权主义是如何理解的呢？

乙：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学术化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先说这个翻译的问题，从“feminism”翻译过来的。实际上在中国理论界也好，在报道中，在传媒也好，在我们平时用的也好，我们会看到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就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就从这两个概念来说，我觉得从翻译的人来说，每个人翻译一个概念的时候势必都有他自己的理解，对这个词的理解，同时他有一个认同，他要对这个概

念本身在那个环境下的理解，同时他要还对这个概念认同，那我觉得这个词就不能说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价值中立的东西。它本身就代表着你认同这个词，这个概念本身的一些含义。实际上我们国家最早 20 年代，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是从西方文化理论中翻译过来这个词，有人叫做女权主义，有人叫做女性主义。但是当时没有争论那么多，等到中国 80 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的一些妇女研究的理论，很多的人从国外回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也使大家越来越多的接触到西方的一些理论。这个时候大家又开始对于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进行讨论--应该说“争论”。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两派，一种观点认为女权主义比较完整地反映西方“feminism”这个概念本身的特质，就是说它不仅仅提倡男女平等，还要有行动，还要质疑现存的社会制度。不仅质疑社会制度，它要挑战还要采取实际行动推翻，真正的提倡实现一种男女平等。但是翻译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权主义比较集中地代表了“第一次浪潮”，19 世纪这时候的女权主义的特点，比如说争取参政权、堕胎权，抗议、游行呀，她们认为代表了那个时候的一些概况，但是随着“feminism”的发展，到了“第二次浪潮”的时候，就是 60 年代以后的时候，就是多元化了，不仅仅是一种运动，还有沟通呀，多种声音呀，就提出很多东西。就在这种情况下，再说女权主义的时候，就不能全面地囊括“feminism”所有的内涵了。所以要用“女性主义”，这是她们提出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她们认为“女权主义”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容易给人一个“very strong”的感觉，见什么都反对什么，不近情理呀，会给人们一种误解。我记得比较突出的几篇文章和几个人物，比如说高惠珠呀，陈一云。但是我个人来说，我比较赞同“女权主义”这个翻译，而且我觉得自己比较认同这两个说法是有差异的。我还认为概念本身一定反映了文化背景，同时你对概念的认同也说

明了你自己对这个概念的接受的程度。我觉得“女性主义”...我们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呢，当然现在提倡“女性主义”者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避免误解，但是反过来我的观点呢，正是因为你提倡女性主义抹杀了女权主义的特质，这个特质是“feminism”的核心。这种核心是要干什么呢，要去推动、质疑和挑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它要提倡男女平等。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愿望和信仰，它更重要的是一种运动。所以我自己觉得呢，我比较提倡应该用女权主义来翻译“feminism”，取代女性主义。虽然坚持“女性主义”的人认为这样会造成误解，但是造成误解的这种东西正好是女权主义的特质和特色，所以正应该是不应该避免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应该坚持“女权”这种说法。因为“女性”在中国这种文化中间，男性、女性、男人、女人，它已经有了一个刻板印象。那你说女性文化、女性特质、女性特点的时候，人们非常自然地就会跟温良恭俭让，就和贤惠这些所谓女性特质联系起来。因为我认为这正好是我们不应该是回避，不应该去迎合的东西，因此我觉得用女权主义更加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来“feminism”的本质和涵义来，更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feminism”所提倡的东西，更应该旗帜鲜明地避免“女性主义”所想逃避的东西，所以我个人就比较赞同女权主义这样的说法。当然我觉得各人有个人的看法，各人有个人的讨论。比如说有人认为“女性主义”更可以反映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态度吧。

甲：那您对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怎么看？

乙：你是说这个概念还是运动？

甲：概念和运动都可以谈……

乙：我觉得中国现在很难说有女权主义的运动或者说类似像西方的这种女权主义的非常典型的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当说第一次浪潮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

来无数个典型的作品、无数典型的代表人物、典型的观点、典型的活动。第二次浪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举出来许多典型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应该是...当你说是一次运动的时候应该是理论和实践的非常自然的结合和弥补，我觉得非常困难地说，中国已经有女权主义运动，我觉得比较贴切地说，中国有一批有女权主义意识的人，在积极地推进女权主义运动，在积极地做社会性别平等的活动。我觉得当你说“运动”的时候，应该是两者的自然结合。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中国...如果说它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的话，在这个领域中间，比较缺乏的是一些人比较关注实践层面，推动一些项目呀、做一些课题，去推动一些活动，这个层面的人比较多。但是对于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观点，理论对女权运动的指导作用的研究不够，我觉得不够，是缺陷。但是反过来对一些女权主义研究比较深的人，我也觉得一些人的文章作品写得不错，但是我觉得在实践方面存在有一些缺陷，当然有的时候是时间有的时候是经费（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真正深入到中国的基层中间发现这种性别歧视，去发现男女不平等的问题，然后力图去弥补不足和消除距离的时候，我觉得这批人又有一些缺陷。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距离。

其实这也是我自己从95年后一直提倡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做研究的人不可以没有活动，但是我觉得做活动的人绝对不可以不做研究，我觉得这两者的结合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我们把研究想得太深奥了，太象牙塔里的东西了，一定要用了很多的特别的概念，比如说什么后现代、后结构，自我等等，好像不用这些新词，就不能够叫做学问了。但是反过来有一些做学问的人，又觉得做活动太吃力，见效也比较慢，但是我觉得这两者应该是要结合在一起。我跟我的同事，尤其是志同道合的同事也共同地做过这样的尝试。比如说95年之后，我们当时在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就成立了一个叫“妇女咨询活动中心”。为什么把它

叫做“咨询活动”中心呢，当时的想法是可不可以把研究，因为你要做咨询、指导要有一些“consultant”的东西，你必须要有理论层面的东西。但是叫“活动”，可不可以把理论和活动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当时就有妇女热线，当时有跟工人日报一起合作栏目，有操作性质的栏目。我们就当时做了一些尝试。紧接着我们又作了一个项目--应该是我个人的第一个活动--叫做“中国农村妇女受教育的状况”，这样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为了我们的95世妇会的论坛服务的。我们当时做了29个村子的妇女（调查）。第一次做这个项目，我跟我的同事们，跟女性学系同事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投入了很多，我们用了参与式的方法，那时我们第一次接触参与式的方法，第一次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做这个项目。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很多妇女不会写字，当时我们让她签名字，她不会签，她说她可不可以画一个画。她说我是养鸡的，我就画一只小鸡，她就画了一只小鸡。那么我们当时让他们画他们家在哪里。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把男女分成两个小组，让这两个小组画自己的家。这两幅画我还保存着。女性的画叫做“我的家”，这个画就是正正方方的一个四合院，这个院中间有很多厢房、厨房、正房，有猪圈、鸡圈，院子中间跑着鸡，人在喂鸡呀，她就画了这样一个画，这是我的家。但是这个男性画的我的家，交给我以后，我当时没有找到他的家在那里，因为他画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画了北京和天津，当时他们在河北，他还画了果园、池塘，还画了县城、商店，最后他画了那么一个点点，那么大幅画的一个点，他说这是我的家。当时我就发现，家在男人和女人心目中间是完全不同的。通过这个项目本身呢，我们就开始研究为什么家在男人和女人心目中间是不一样的？通过什么样的教育呢，我们生下来是一样的，为什么生下来我们就逐渐地变成了这样一个“男人”和“女人”了呢？我们又开始了把这

种研究拿到课堂上去做，我们就开始研究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男性和女性，我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间受到了什么不同的培养，这个社会是怎么样刻意的把一个自然人分别培养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所以在这个活动中间，我更深刻地理解波夫娃说的“人不是生为男人，而是长为男人”的道理。所以我想起来，像这样的项目活动，不仅仅是一个实践方面的操作，多少女性是文盲，多少女性是初中文化程度，多少女性有钱上学，多少女性还有愿望继续上学，不仅仅是这样一个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我觉得对我们理解中国农村的妇女的状况，她们的想法、意愿，以及这种背后的原因，和这种原因联系的文化制度，我们就可以有机地联系起来。我记得当时我们选择了一批人到北京来参加 95 世妇会预备会，很多妇女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住在宾馆里面，第一次见到这么热闹的地方。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妇女的跟我说，北京人怎么这么好，后来她们走了以后，我们真正地坐下想了好几天她们的这种感想。我们压力很沉重。我们把她们带到北京来，见了这个以后，对她是好还是坏呢。我们想了很长时间，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她马上就感到不公平和不平等，心里就感到特别的压抑。所以说我们就在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把她领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让她突然有了这样的眼界。我们反思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以后都是我们在课堂上、做研究中间想到的一些东西。这些活动对于整个“women's studies”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和基础，这只是一个项目，一个小例子，其实我们后来做过很多这种活动，或者说项目或者说是课题，我觉得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甲：这种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哪些领域？您自己的？

乙：我自己比较集中一个就是婚姻家庭。我觉得历来呢，由于中国人对婚姻家庭的看重，实际上它的家庭观点、家族关系逐渐地渗透到社会其他的方面。所以我

对婚姻冲突这块比较关注，另外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妇女的健康，主要是妇女的心理这块。

甲：您的个人的实践活动都集中在哪些方面？

乙：我自己的活动，应该说，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到了全国妇联妇女干部管理学院，然后这个学校又改为中华女子学院。那么我原来在这个学校，在妇女运动系当老师，后来我就在这个系里面做了系主任，然后这个系改名为社会工作系，有妇女工作方向，那么我在这个系做系主任，然后到学校来承担学校的一些行政工作，现在就做了这个学校的常务副院长。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自己呢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教学岗位，所以我的很多活动一直在这个系中间，跟这个系所有的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比较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做的大的活动像是反对家庭暴力呀，还有像是边缘群体妇女的状况，比如说下岗女工呀等等，边缘群体妇女的社会网络、支持，另外还做过比如说社区干预的模式...模式的建立等等，我们做了比较多的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活动比较大。

应该是，我觉得这些活动本身，一个方面推动了这个系里面的妇女研究的发展，培养了一支队伍。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于社会...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个区里，北京市的一个城区的一个综合干预的项目——比如家庭暴力综合干预，那么这个时候综合干预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课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研究了，实际上把这个社区的综合治理，行政、司法全部放到了一起，所以参与的人就涉及到了行政系统的、公安系统的、司法系统的、NGO的和家庭的各个层面的人都放在了一起。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整合的研究中间，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做课题的意义，我觉得对整个中国社区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来说都是非常积极推动的意义的。

甲：您刚才说到，把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还有教学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这种结合给您带来的个人层面的变化是什么？您在这当中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乙：因为这些都是大家来做的，所以很难说个人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因为对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断升华的一个过程，就是越来越多地对很多问题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感到了不公平，越来越有了这样的冲动，就是不仅仅是质疑和挑战，而且是要去真正地去行动和变化。所以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在这个女子学院呢，女性学系、社会工作系，还有其他的一些(系)法律系，我们都提倡一种“Research and Action”，就是研究和行动的这样的模式。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模式来说，培养出来的学生来说，她也受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学生去市场上面去工作、去竞争的时候是一种综合素质的提高。比如说对于自己的自我认识，充满信心，对于不公平的一种挑战。比如说我们学生到了这个招聘市场上，有一个牌子立在那儿，说“女生免谈”，很多大学的学生在那个牌子前面，看一看，走来走去了就走掉了，但是我们那个学生站在这个牌子跟前，就坐在那里了，就问那个招聘的人，她说你要招什么样的人，他说我招什么样的人，她说你要招这样的人我都符合条件，为什么你不要女的。这个人说你是哪个学校的，她说我是中华女子学院的。他说你们学校的学生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学校的学生说你这样写是不对的，这样写是犯法的，你这样写是可以去告你的，这个学生说我有这个条件的，我满足你的条件，学历水平呀，你要求的技能呀我都够，为什么你不要我参加。后来那个人说我可以把这个意见反馈给我们主管，让我们主管是否可以和你讨论这样的问题……于是我觉得研究和行动和老师的提高和学生的综合提高是整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很难说，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明显的变

化。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化是通过系里的影响、学校的影响、学生毕业生的影响，通过这种不同层面的综合的素质反映出来的。

甲：但是对您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呢？

乙：我自己觉得，如果一定要说个人的影响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只做研究的一个学者，我觉得非常愿意参加一些实践的活动。所以我再忙，我一定会对比如说要有课题，我一定会深入下去做，去作访谈，去做调查，或者去做在最基层。对我来说，我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非常想有实际行动，非常愿意有实际行动的女权主义者。

甲：您作为一个中国唯一官方女子大学的——中华女子学院的院长，您是怎么通过行政的手段，使这个学校开展女性主义教育？学院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乙：我自己呢做这个位置呢，是99年的3月份，99年的3月份正式做这个行政位置之前，我还做了一年的教育长，学校里还有一个专门主管学校教学工作的这个教育长的职务。如果说“官方的”“唯一的”女子学院来说，其实前面的两个定语来说，我说我们能看到一些问题呀。当我们说一个“官方”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呢意味着受到很多体制内的限制。当我们说民间的时候，是说我们有比较大的空间，是说你有比较多的余地。当我们说官方的时候，你就势必要受到政府的、有关部门的种种条例的影响，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大学中间，截至目前，不可以有女性学系，开设不了女性课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研究中心等等，就没有这样一些架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妇女学在大学中间，现在不仅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也没有妇女学的位置，所以不可能像国外一样，招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的本科生呀，硕士生，博士生研究生呀，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大学中间开始妇女研究……有这样氛围是在95年以后，但是应该

说是自愿的。没有得到学校的实质意义的支持。你比如说允许你成立妇女研究中心，但是你没有地方、没有人员编制，就意味着你就没有工资，那你就没有很多资源，所以很多事情你并不能做...实际上你一定做不起来。但是在中华女子学院，这样的特殊的学校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全国妇联的，全国妇联在中国是最大的一个 NGO 组织。当然现在很多人质疑全国妇联 NGO 的身份，有的人说是 Semi-NGO，说是半官方的，那我们说的官方的和半官方的时候，质疑的人总有一些原因的。比如说妇联的编制，工资都是由政府拨款的，这是一个事实，确实全部都由政府拨款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妇联呢，没有决策权，所以妇联并不参与到政府的任何决策体制中间去，所以你只是一个桥梁，所以你只是一个桥梁而已。因此呢妇联这个组织呢，她就又有很大的空间。那么女子学院呢就非常特殊地放在这样的位置，它既属于全国妇联管，因为它是全国妇联下属的学校，但是她同时又属于教育部管的，因为学历教育全中国的都属于教育部的，所以说我们就等于是两个主管单位。从全国妇联的角度来说，我们承担着培训妇女干部，这个推行男女平等这个基本国策，推行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女性“四自”精神等等，我们肩负这样的任务，所以说这种妇女研究，研究妇女问题对全国妇联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份内的工作，因此这是我们和其他的任何一个大学不同的地方。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说其他的大学是在争饭吃，我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说在中华女子学院里面研究妇女问题是理所当然。但同时我们又属于教育部管，教育部管你的课程建设，管你的专业设置，管你的学院的发展的规模 and 方向，这样一来呢，我们受到极大的限制。比如说你有女性学系--我们建立了一个女性学系--但是女性学系发什么学历呢？什么文凭呢？不知道。你要是去招女性学系的本科

生呢，不可以，为什么呢，没有这样一个一级或者说二级学科目录，不可以招“ Women's studies” 的学生，那么你就不能给这些学生发文凭。这样一来呢，你就受到它的绝对地限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说，既有挑战但是又有很大的机遇。这个时候我碰巧当这个院长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比较自愿的女权主义者，我非常认同、接受、赞同这样的一些女权主义观点，而这些观点应该严格地说应该与妇联的观点而且与政府的基本国策实际上是相同的，因为最终的目标是我们就是要男女平等。同时呢我和其他的人有不同的，我非常幸运地又有了一些权力，我确实又有一些权力，我可以适当地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做我可以想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就成立了女性学系。实际上女性学系是从社会工作系独立出来，这个社会工作系前身我们叫做妇女运动系，妇女运动系改名为社会工作系，是因为我们想把妇女工作纳入到社会工作这样一个比较泛的学科下面来，我们把妇女工作看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部分。但是妇女这个群体又是我们社会工作系的关注的对象，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工作系的课程设置、课题和研究都围绕妇女这个群体开展，这是我们的特色。这个女性学系的成立，我们就是专门要做妇女研究，培养一些可以在其他的院校和系统进行研究的，具有这样能力的人。而我们在社会工作系我们比较关注是操作层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女性学系。那么女性学系以后的招生，我们想从社会工作招生，但是女性学的方向。所以就利用这个政策的空隙，走一些边缘的道路吧，但是毕竟我们有了女性学系。当我自己做了教育长，然后是常务副院长，我就开始考虑，作为全国唯一的女子院校，首先有的一个挑战的问题，“女子院校”并不意味着你就有这个社会性别意识，并不意味着你就自觉的开展妇女研究，并不意味着你完全就可以进行男女平等的推动活动……。

那么等到我在这个教育长的位置的时候，应该是说我既有这样的权力，但同时呢，又有这样的平台，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平台的话，就好像在其他的大学校长，你有这个权力你也没有用，因为你的领域中间不给你搭这个平台，那么我正好又有这个权力又有这个平台，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比如说，有一些大学校长也挺赞同和认同女权主义的，但是他不可以推行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些人呢，他非常认同这个东西，但是他推行不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真的是比较幸运的，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理想和工作能够比较自然的结合在一起。像我刚才说的系部建设呀，那么我就逐渐地开始考虑一些问题。那么考虑这些问题呢，不仅仅是机构的建设，也是考虑到一种本质上的推动，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你比如说，从机构来说，有女性学系、社会工作系，那么社会工作系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关注的对象呢就是女性这个群体；还有法律系，那么我们学校的法律系呢，重点是什么呢，就妇女权益保障，还有儿童，就是妇女儿童这两块。就是说也很自然的有了自己的特色，同时也把妇联的目标放在里面去了，当然同时也把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的东西放进来了，但同时又和整个大的教育体制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试图在系部建设上做了一些调整。同时，你比如说学校里有图书馆，图书馆我们就有女性书库，最近我们还要办一个女性信息资料中心，想把它办成全国最大的具有电子查阅，有这个文本，有各种网络等等，想把它做成一体的。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个，中国最大的、最全的、最方便的这样一个女性书库，这个“书库”的意思是包括各个方面的。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一些调整和部署，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另外呢，你比如说，在这个科研方面，学校的科研，重点支持课题就是跟女性有关的，这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你中华女子学院，要申请课题，

比较要集中突出在女性这个上面，所以女性的各个方面可以研究。 因为我们有各个系，我们有 9 个系，有 30 多个专业，那么我们这个 30 多个专业，你都可以跟女性联系起来。你可以做女性文学、女性健康，幼儿园长的社会性别的培训等等，我们都和女性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同时在课程设置之外，我们还开设了全校的这个必修课，叫女性学。这个女性学不仅仅是一个 40 课时的课程介绍，实际上我们想在这个 40 课时讨论中，把精华东西放在中间。所以有不同的专题，比如说女性与社会、女性与健康、女性与就业、女性与权利等等，把它放在不同的专题中间。这样每个系，只要你是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你必须上这个课。这个情况，应该在全国是没有的。而且我们也明显地看到了学生在这个方面的受益。你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学生出去找工作，她就知道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课程上告诉过她，不可以有性别歧视，广告中间的性别歧视，招工中间的性别歧视等等，像甚至包括一些工作场合中间的性骚扰等等。甚至像我们的体育课，我们也有一门课叫做“女子防身术”，也教给学生一些保护自己的一些...从法律上保护自己、从行动上也要保护自己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特色的课程，实质上是围绕这个核心进行的。

另外，就是在整个学校的教学中间，我们就非常提倡教学、科研和实践三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这样一个教学模式从大的平台来说呢，是一个学校的定位问题。就是我们学校是放在研究生院呢，还是放在综合大学呢，还是放在以本科教育为主精品式的这样的大学里面呢？那么我们就把它定位在，我们要办有特色，比如说求特不求全，求精不求大等等，就提出来这样一些口号，就是要培养有“四自”精神的这样一些女性人材啊，不同领域里面的女性人材。在这样的基本理念下面，实际上我们知道，你要在课堂上搞课程改革，在课堂上搞教学方

法的改革，你要提倡学生参与实践，你要提倡老师们做科研。那么这个中间呢实际上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的问题，所以老师跟学生的沟通、老师和学生跟社会的沟通，就存在这样非常大的链接。在这样的过程中，“师道尊严”呀，“老师知道就是对的”呀，“学生只听不想呀”，这样一些传统中国教育过程中间的东西，其实在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的改变中间呢，就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其实也是女权主义提倡的实质的东西。就是人人平等、人人有机会，那么就把这样的东西渗透到了教学方法、课程、科研和社会活动中间来...就放到这样的过程中间。所以我们的学生出去搞社会实践活动，比如说对流浪儿童的关心呀，到流动学校去作志愿者，我们的学生就逐渐的有了人人平等，大家机会均等呀，要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这样的精神，要去拼搏，要尊重自己等等，就把这样的东西渗透到了整个教学每个环节中间。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位置上，应该还是比较幸运的，同时有这样两个平台，就是女权主义的平台和正规学校教育这样的平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学校是中国唯一的，就是开设女性学课程--我们就翻译“women's studies”的一所高等院校，同时也是唯一拥有女性学系的这样的院校。所以把它办成集科研、实践、教学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也希望我们学校的服务能够给其他的大学，甚至给国外的学者到中国来，进行中国妇女问题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作为这样一个学校的常务副院长来说，我自己在推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应该说也有一个很好的机遇和平台，一些机遇和平台。所以在推行一些工作中间呢，比其他的院校来说要顺利和容易得多。当然对于很多其他的领导来说，大家并不是有意识地来接受女权主义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意愿呢，这个学校有特色呢，这个特色在哪里呢，这个特色呢要定在妇女研究上面，因此大家呢就比较容易接受我这样的一个总体设计和想法。

所以在推行中间，应该说这些年来，从改成中华女子学院以来，从85年...从95年正式改名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自己的特点，越来越有一批比较知名的妇女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也越来越在社会上有了一些影响。

甲：那您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些什么困难，比如说您自己的女权主义的价值观和全国妇联的作为一个官方组织的价值观，或者和学校的其他领导的价值观有什么冲突呢？

乙：这个应该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当然不仅仅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权主义的价值观和大家的冲突，在任何事情上面，互相的冲突都是存在的。但是，你提的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你比如说在其他的学科中间要规定必修课，这个就是一个阻力。艺术系的说我为什么要学女性学课，护理系的说我为什么要学女性学系课程，服装设计说为什么要学女性学课，就是大家都在质疑，都在认为我的课程...本来就给我1600的课时，我再加上你的课时，我就安排不了。本来我们的课程就有很多不得不上的一些公共理论课、基础课，这都是由于教育部体制下来的哪些是必修的，已经有许多了，那你还给我加一门课。所以我就要跟每个系里面的系主任这个层面，我就要有一个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那么一方面我觉得我跟大家说清楚，这个课程在女子学院建立课程的重要性。说女子学院你再不培养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女生的话，应该是一个失职，作为全国妇联的女子学院来说，我们培养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你要培养成有“四自”精神的目标，你就要在你的课程上边有所体现，那么是一个必要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行政手段，你不上也得上，我的课就是要上，就是你必须要按着我的命令执行，就这样推下来了，所以大家也就不得不接受。但是上了几年以后，现在反过来...因为我们每一个门课程上完以后，我们都有一个测评，都有一个学生的反馈意见，这个时候系主任和

大家都比较满意，就是我们这一批的老师课程本身，内容比较好，学生欢迎，老师的讲课的基础好，基本功好，那么学生欢迎。另外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这门课程的基本理念和学生的这种交流、沟通、参与，学生的讨论...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特别的能够发表她的意见，所以学生对这门课程都是非常接受。这样以来每次评价这门课的时候，基本上在系里面都是处于优秀水平的。所以逐渐地现在呢，就大家都很自觉得接受了这样的课程。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有一些障碍。

另外呢我就是觉得这种障碍是一种潜在的，它不是成心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一种差异。比如说我们在推行说女子学院的特色的时候，有的人大家说：“对对，应该有特色。你看那个女孩子站也没有站像，坐也没有坐像，走路也不好，应该教她们怎么穿衣服，应该教她们怎么样形象应该很好啊.....”，这些东西我自己觉得...我从来不提倡作为女权主义者，就应该蓬头垢面，就什么不顾，应该乱七八糟，从来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我们不能刻意把学生按照大家认为女人什么样去培养，那么这个女子学院是一个失败的教育，对不对？但是这种情况下，你有时和有的领导、老师交流沟通的时候，这是一种观念上的碰撞，这是观念的碰撞。就是说大家都想把这个学校有特色，这个学校要提倡“四自”，女性要有自己的培养的目标，但是真正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说的其实是两回事情，就是其实上你们做的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就是这个观念上的碰撞、差异，这种交叉而过--就是大家想往一起走，但是走不到一起。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另外呢，从全国妇联的角度来说，毕竟它是一个党连接妇女群众的桥梁，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它要一定要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因此，在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一些概念上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就看你们怎么去理解和处

理。非常典型的就是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从 95 年以后大家都开始用了，大家都知道了社会性别，也知道"sex"和"gender"的区别，也知道“gender”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背景，也知道“gender”是一种性别的平等，也知道“gender”本身要挑战社会制度等等。说大家对“gender”的理解就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妇女组织和很多的人在用这个"社会性别"的时候是不自觉的。比如，联合国文件是这样说，要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层，那么中国政府或者说妇联在制定这个规划的时候，说我们要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很自然地把这个话题放到这中间来。那一放进来发现，这个社会性别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说社会性别？我记得当时一个中央领导问我，中国从来没有提出不提倡男女平等，对不对？男女平等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国策，而且我们推行了 50 年，而且男女平等的口号是人人皆知，深入人心。你现在非要说社会性别意识，非要说社会性别盲点等等，干吗要另弄一套？他的意思说我不是不同意，我是说为什么我们不用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理解的、已经知道的概念，把我们的这些东西放进去呢？他当时给我的启发很大。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讨论某些问题的一种出路，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不可以较真儿，不可说我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不给我这样，我就不能办或者说我就不办，那你就办不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在一个框框里面实际上讨论你自己要讨论的内容。实际上我真正在想，社会性别和男女平等它的差异性和一致性地方，我觉得他们一致的地方是很多。你不可说，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以这样的理解。我觉得男女平等，提倡男女平等，作为一个基本国策，而且中国共产党做了这么多年，你一点都不可否认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推行男女平等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我觉得至

少有一点,没有一个男人敢说,“我就是大男子主义”,“我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大男子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为什么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呢,这是教育出来的结果,这是真正在这个政府推行男女平等这个过程中教育出来的结果。他只会告诉你说“我可不是大男子主义呀,我可是尊重妇女呀”,不过呢,他就反回来(说);“但是这个女的就应该做点饭,就是应该管孩子,你说一个女的不管谁管呀……”,他就很自然地把话给反过来,但是他不会戴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帽子,这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出来的结果。

但是一个事情启发了我,是什么呢,当时我们做社会性别培训的时候,有一个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当时我们说男女平等,它在某程度和某种环境的时候,当我们说男女平等时我们要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你怎么说平等,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实际上是男人的标准,所以你是说女性不平等,女性要参政,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标准是参政这个领域是男性的,现在我女人要进来。现在女性不平等是因为90%是男性占着,所以我要增加比例,增加比例就是平等。那么我觉得这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这个时候你用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作为分析框架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不对,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不是要增加女性比例,我们实际上要做的是两性的平等的问题,那么我就说“男女平等”的标准是男性标准。那么这个女性就在这个培训会上问我,那么没有标准了,什么是标准呀?当时我就真的觉得这可是一个问题,没有标准什么是标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框框,这个标准就还应该是男性的标准,你把这个标准去掉了,那哪里还有标准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创立一个新的标准,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人平等。如果要是说你这个领域仅仅是男性的,我增加比例就是男女平等了,那对女性是不公平的,这就根本违反了亚历士多得说的,基本原则...公平的基本原则,就是

“ 同等人同等对待之，不同等人不同对待之”，如果你把不同等人放在一起让他们去平等的时候，永远对一些人是不平等的。这对我启发很大，所以我开始考虑到，实际上我们的一些概念我们并不需要把它绝然地，就一定要这样，就一定不能那样。我们在推行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呢，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个中央领导他就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批评那个省长，说这个是男女平等，你这个是大男子主义，那个省长就说“ 哎呀，这个我可没有，我一定要改正呀……我要努力的去做啊。” 如果你告诉他你这是社会性别盲点，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中间存在一个对 “社会性别” 和 “男女平等” 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认识的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社会性别” 这样的概念，它要能够推行到像“ 男女平等” 这个概念人人皆知，大家都接受，甚至就是说可以去评价它的时候，你还有一个非常长的路要走。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返回来说就是你刚才问到在推行过程中有的一些什么样的障碍，就是我在推行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一些问题。这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异。我就觉得在这些方面呢，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身份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是一个纯学者的身份，一个问题我不可以说这个问题就是在学术领域里讨论，你同意就同意，你不同意就拉倒。对于我来说，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这个行政职务，那么作为这样一个行政职务来说，我还有一个我的规则，我要遵守的一个规则。如果在这个规则之下，我不遵守这个规则，那么我的选择呢，要不然就是我放弃，要不然就是人家把我放弃。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我确实是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我觉得，幸亏是同时有这样两个平台，所以我就觉得在推行女性研究，推行这样一个以女权主义基本理念为基础的整体的教学改革方面，我就觉得做的还算

是比较顺利。

甲：那给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乙：你是说克服障碍的问题上？

甲：整个的，就在您的工作中整个给您最深刻的感受？

乙：我是觉得呢，就是回到你的大问题上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官方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唯一的女子学院领导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是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做成事情的话，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双重的身份，否则的话很多的事情，你是不能做的。

甲：那您对于个人和学院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乙：实际上刚才我也说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作为这个学院的一个领导来说，我现在就是和大家一起，把这个学院定位在一个精品式的，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女子学院的这样一个定位，就定位在这里。但是，什么叫"精品"？精品的意义就要大家一起来创造了。比如说，作为一个学院的领导来说，我要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在就业的市场上能够非常容易的就出去。你要让学生在就业的市场上能出去，除了她掌握各种技能之外，比如说法律系的她要懂得法律知识，服装设计系的学生要懂得色彩、裁剪等等。除此之外，我希望我们这个学院出去的学生能够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一批生力军。能够自觉的，不自觉的，能够有这样一种，把推行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职责的这样一种意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特色"的问题。特色呢，我仍然还是想定位在妇女这个群体上，因为我觉得不可以放弃这个平台。在全国妇联这个平台上面，作为全国妇联的大的方向。对于它的这种目标来说，我觉得和我们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要达到一种平等，至于我们怎么样去做，那是我们大家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特色是不可以放弃的。

因此，其他的各个系，研究活动和实践所有的环节，都还是要集中在妇女这样一个群体上面。但是，突出要培养一些...比如说女性学系，我们现在，已经和香港中文大学和密西根大学，联合办了第一批的研究生班。我们自己的设想是在中国首先拿到硕士学位的授予点。为什么我们不做学士学位的招生呢？因为在前一两年的考察中间...作为一个学院的行政的领导，我还势必要考虑学院的学生的出口的问题。这个如果是“Women's Studies”的本科生，那么在就业的出口上，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想定位在硕士研究生。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除了学生整体素质之外，除了我们的女性学系搞一个硕士点之外，我们最想做成的就是中国最大的最全的一个妇女研究资料中心。有这个文本的，有各种电子图书的，有各种信息的，想把它做成是一个最大的资料中心，既提供给学院，同时也提供给整个的国内外的有志于和有兴趣于妇女研究这样一些人士，为大家服务。这个新的图书馆教学大楼，我们准备明年开工，希望两年内完成。如果能完成的话，那么在我们新的资料中心，同时还想在二层建一个妇女博物馆。博物馆在二层大厅。这个设想能实现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位的这几年非常想作到的一件事情。

甲：您对个人的未来有什么设计？

乙：我个人，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我希望这几年完成了我的行政工作之后，踏踏实实的在系里做一个比较好的老师。

甲：最后请您对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发展，进行一些评价和展望，还有会遇到哪些困难和阻力，您给分析一下。

乙：我也很难概括这个问题。我也确实想了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难做。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层面。一个，我觉得在这个学术领域里，

我觉得是一个发展最迅速的一个领域。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领域中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这种教育体制的改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国外回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我觉得在学术领域里，应该说这种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的这样一种研究，在近几年中应该是一个比较顺利，和比较迅速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自己估计，要是把它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得到国家教育部的认可，和国外一样，能授予各种各样的学位，我觉得还有一段路程。因为大家仍然还觉得，它连一个边缘学科都算不上。那么我们大家要做的工作恐怕就是所有的，现在很多人都在做，比如说天津杜芳琴、王政，还有我们学校，还有北师大，我们在联合做一个在高校推行妇女研究课程的课题，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能够在高校中间，形成一些影响和气候。在有了一些基础的时候，你在国家教育部认可和同意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前提条件。我觉得这是一层。另外一个领域，我觉得应该是做的比较顺利的是妇女发展这样一个领域。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领域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不管他们接受不接受女权主义思想和理论，实际上他们已经发现这个领域做课题...不，在这个领域做项目，这是比较容易找到经费的一个领域，你看大的基金会，甚至包括国家一些投入，比如说是妇女就业...再就业的工程，农村妇女的培养，边缘妇女群体的救助等等，这样一些项目，我发现是比较多的人已经开始关注。尽管一些领导的观念中，他可能没有自觉的接受女权主义的一些理论、想法、观点，但他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干，因为有资金。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和妇女研究领域一样，应该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应该会比较快的。应该说这两个领域，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我仍然认为是比较分离，仍然是搞研究的人，比较关注于纯学术研究，但是搞项目的人，又比较投入于项目的执行。所以我感觉，恐怕这两方

面的结合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象国外，它不太一样，它有一个研究领域，它有一个研究领域的市场，比如它有女性学系，有各种各样的学位的授予点，自然就有它的经费。而且它既然有这个学科，就有一种认可，学生既然选择了这个学科，学生自己就要考虑到市场，学生自己就要考虑到出路。但是中国就不太一样，因为中国的大学还存在一个就业率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教育部又要公布各个大学的就业率，你一公布就业率，这对大学就是一个压力，就不会让你就业比较差的这样一些领域的，这样一些学科让你招生。甚至它要规定，比如说就业率不到50%，你的学科（招生）就自动取消，那么这也是一种压力。所以我就觉得，你要让这两个领域的发展比较快，你要让它们都各自形成一个气候，这我觉得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路程。但是应该说，妇女研究这个领域和妇女项目这个领域中间...妇女参与发展项目这个中间，应该现在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物，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应该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这两个领域发展应该是最快的。

甲：谢谢，张李玺院长。

乙：谢谢你。

2003年6月于北京中华女子学院

访谈员：石彤